

中国出口贸易的内生动能： 来自地方文化的力量

李 红 韦永贵

摘要：本文基于跨文化领导及其有效性（GLOBE）数据，考察地方文化这一内生动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以文化创新性和包容性为表征的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这一效应具有渐进性、长期性和动态性特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及沿海省份的文化对出口贸易的效应系数比其他地区均高。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地方信任、市场化以及企业家精神的中介作用进行传导，但地方信任发挥的中介效应较弱，而市场化和企业家精神在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中发挥重要中介效应。本研究对于从内生的文化动能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及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键词：出口贸易；文化创新性；文化包容性；内生动能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0) 12-0065-16

引 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并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积极“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尽管中国对外开放的纵深推进促进了出口贸易的整体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出口贸易发展差异与失衡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具体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东部沿海地区出口贸易规模与增速均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则远远落后。这种失衡现象的形成，除了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贸易制度的非均等化等因素有关外，还与基础性的文化因素有关（李光勤等，2017）^[1]。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受自然地理分割、社会制度分隔、人文历史分离等因素的影响，各区域地方文化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块状分布特征，哪怕后来受到通勤条件改善、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外生因素的冲击，但文化本身牢固的地方根植性和代际垂直传递性使其内在

[收稿日期] 2019-07-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双向开放对边疆经济地理的作用机制研究”（71763002）；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区域经济合作-分离-协调的文化动力研究”（2019GXNSFAA245096）；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制度-文化-地理边界对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影响研究”（2020KY16008）

[作者信息] 李红：广西大学商学院教授；韦永贵（通讯作者）：广西财经学院广西（东盟）财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电子信箱 1059156896@qq.com

特质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撼动。同时,文化的开放包容性与创新性对经贸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高超等,2019^[2];赵子乐和林建浩,2019^[3])。尤其是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学界就如何推进文化开放包容与创新以促进经贸合作进行了相关探讨,并认为文化包容性和创新性是推动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

本文运用赵向阳等(2015)^[4]的研究数据,采用改进的TOPSIS法将各省的地方文化聚类为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并结合各省份的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各省份的出口贸易与地方文化之间存在地理空间上的高度匹配关系,即中国各省份的出口贸易额与地方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总体上均呈现出自东向西依次梯度递减的趋势。这种看似“巧合”的高度匹配关系与正相关关系一方面似乎意味地方文化是影响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地方文化有可能是推动中国地方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内生动能。为验证这一推断,本文采用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作为地方文化的代理变量,探究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检验地方文化是否是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内生动能。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内在影响

文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被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才国伟和刘继楠,2016)^[5]。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多注重从经济因素去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不同,新近的贸易理论更加注重将经济、文化、制度、地理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在关于文化与贸易关系的探讨中形成了两种差异明显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将文化视为交易成本,认为文化对国际贸易具有阻碍作用。如Combes等(2005)^[6]从消费者偏好角度构建文化因素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模型,认为国家间的文化差异越大,越不利于贸易的发展。罗能生和洪联英(2006)^[7]在考察文化冲突的贸易效应时,发现文化冲突已成为全球化条件下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和贸易发展的显著障碍,对于贸易出口国而言,文化冲突导致出口国的贸易结构恶化、贸易收益降低以及工人福利受损。另外,众多学者通过国家间的文化距离来研究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包括宗教信仰(Hergueux,2011)^[8]、语言(Ginsburgh et al.,2017)^[9]、信任关系(Alesina and Ferrara,2001)^[10]、价值观念(Deardorff,2014)^[11]、殖民关系(Eichengreen and Irwin,1998)^[12]、移民(Tubadji and Nijkamp,2015)^[13]、基因(Spolaore and Wacziarg,2009)^[14]等。他们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地认为由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化成本对国际贸易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第二类观点则认为文化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将这一动力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由文化引致的需求动力、信任中介动力和文化空间流动形成的流动力。其中,在需求动力层面,白玲和吕东峰(2001)^[15]在其构建的文化互补理论中指出,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差异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创造贸易需求并促进国家间贸易的发展。罗能生和洪联英(2006)认为文化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推动国际贸易增长和发展的现实动力。田晖和蒋辰春(2012)^[16]也指出文化距离能够为消费者营造神秘感和新奇感,从而形成两国产品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并促进跨国贸易的发展。

Rauch 和 Trindade (2010)^[17] 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文化差异是贸易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信任中介动力层面,大量研究表明,信任是推动国际贸易的重要动力 (Zak and Knack, 2010)^[18],而信任的塑造往往源自于相似的文化背景。如 Lee (2013)^[19] 研究发现,相似文化有助于增进信任,构建起“信托机构”,进而维持贸易网络成员之间合作与共谋,推进相互间投资合作与经贸发展。Guiso 等 (2009)^[20] 也指出,相似的文化背景往往更容易形成身份认同和情感信任机制,并能有效建立起忠诚的贸易伙伴关系,因此,由相似文化塑造的身份认同和信任机制已成为促进跨国贸易的重要动力。在文化空间流动动力层面,李红等 (2012)^[21] 指出,文化之间的引力以及沟通、对话或交流等需要,即文化间性,成为异质性文化合作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桥梁和动因。近年来,从文化流动,特别是文化交流角度切入探讨国际经济合作的研究不断涌现,如谢孟军 (2017)^[22] 研究发现,孔子学院的建立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播,增进伙伴国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进而促进中国投资与经贸的发展。苏剑和葛加国 (2018)^[23] 指出,语言推广能够通过网络外部效应与产业效应衍生语言红利,从而促进经贸的发展。赵永亮 (2012)^[24] 则以移民作为文化空间流动的代理变量,认为移民能有效增强移入国对移出国文化的认同,从而对移出国的贸易具有消费偏好效应、成本克服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

虽然当前关于文化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泾渭分明的主线展开并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但事实上,文化成本论在论战中一直占据上风,而关于国际贸易的文化动力的研究明显不足。近年来,虽然有部分研究从需求、供给、信任以及文化流动等文化动力角度考察文化对国际贸易的正向效应,但这些研究多从跨国角度去分析,而缺乏从一国内部的地方文化去研究内生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另外,尽管已有研究对文化在国际贸易中的效应尚无定论,但结合前文分析中地方文化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的高度空间匹配性及正向关联,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H1: 以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为表征的地方文化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推动作用。

(二) 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的内在机制

韦永贵和李红 (2019)^[25] 的研究指出,文化作用于国际经济合作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塑造个体的行为偏好直接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的选择偏向性;二是通过塑造身份认同,构建信任机制,进而影响国际经济合作;三是以经济行为体的制度水平作为介导对国际经济合作发挥作用。就地方文化而言,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也可能遵循着一定的机制路径。

首先,地方文化可能通过塑造信任机制,进而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Greif (1994)^[26] 指出,信任机制的构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在机构和制度上存在的不确定性,防止经济交易过程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Guiso 等 (2009) 的研究也表明,信任能够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双方合作的开展。曹春方等 (2019)^[27] 在研究地区间信任与集团异地发展中指出,地区间信任能够降低异地市场交易成本和集团组织成本,进而对集团异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现实情况也表明,若一个地方的经济行为体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则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合作者与

之开展经济合作。而信任的塑造与当地的文化密切相关,例如,中国历史上徽商、潮商的崛起壮大就得益于守信经商的文化。因此,地方文化对于地方信任的塑造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信任又会影响到经济合作的开展。对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H2a: 地方文化在影响出口贸易中存在以地方信任为中介的作用机制。

其次,地方文化通过影响市场化水平进而作用于出口贸易。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市场一体化不断推进的发展趋势下,市场化的提高对于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丁从明等(2018)^[28]研究指出,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构建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一体化市场,由文化、制度、地理等因素造成的市场分割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障碍。高翔和龙小宁(2016)^[29]也认为,文化分割所造成的省内文化差异会形成无形的市场壁垒,并显著降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事实上,一个地区市场化程度固然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制度有关,但本质上地方文化才是决定市场化最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因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制度长期受到该地区文化的影响,换言之,文化在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制度的制定中具有重要作用。对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H2b: 地方文化会通过影响市场化水平进而作用于出口贸易。

再次,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可能通过企业家精神进行响应。陈宪和韩太祥(2008)^[30]认为,文化通过影响企业家精神及其职业和管理选择机制,进而影响总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林建浩和赵子乐(2017)^[31]的研究表明,技术扩散有利于刺激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而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间接效应往往通过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事实上,一个地方的企业家精神通常与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密切相关。因此,由地方文化塑造的企业家精神有可能是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对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H2c: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进行传导。

综上分析,我们将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可能的三个作用机制分别归结为信任渠道、市场化渠道以及企业家精神渠道。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 计量模型

本文以 Tinbergen (1962)^[32] 和 Poyhonen (1963)^[33]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应用到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并对其加以修正扩展,构建如下引力模型:

$$\ln Export_{it} = \alpha + \beta_1 culture_i + \beta_2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i 为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单位; t 为年份; $\ln Export$ 为各省份年度出口贸易额的自然对数; $culture$ 为文化变量集合,包括文化创新性(fp_ccul)和文化包容性(fp_tcul)两个变量; X 为影响出口贸易的其他控制变量矩阵; ε 为随机扰动项; β_1 为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系数; β_2 为控制变量系数矩阵。

为了检验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的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4)^[3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增加方程(2)和(3),与方程(1)一起检验地方文化对出

口贸易的直接效应和通过信任、市场化以及企业家精神等中介变量对出口贸易的中介效应。

$$Med_{it} = \alpha + \delta_1 culture_i + \delta_2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ln Export_{it} = \alpha + \gamma_1 culture_i + \gamma_2 Med_{it} + \gamma_3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根据中介效应模型的含义,方程(1)的系数 β_1 是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总效应;方程(2)中 Med 为中介变量,系数 δ_1 为地方文化对中介变量的效应;方程(3)的系数 γ_2 是在控制地方文化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出口贸易的效应;系数 γ_1 是在控制中介变量影响后,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由 $\delta_1 \times \gamma_2$ 衡量。在中介效应检验过程中,若系数 δ_1 和 γ_2 都显著则表明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存在中介效应;否则需要进一步用自举法(*Bootstrap*方法)检验方程(2)和(3)中 $\delta_1 \times \gamma_2$ 是否显著,若 $\delta_1 \times \gamma_2$ 显著,则表明影响机制中同样存在中介效应。

(二) 变量及数据

1. 被解释变量:出口贸易额

本文以1994—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出口贸易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年的《统计年鉴》。

2. 关键解释变量:地方文化

本文借鉴赵向阳等(2015)的研究,以GLOBE文化系统中的中国数据作为国家内部的文化代理变量。GLOBE文化习俗分为不确定规避、未来导向、权力距离、社会导向的集体主义、人际关怀导向、绩效导向、小团体集体主义、性别平等、恃强性等9个文化维度。本文根据各维度文化的内涵,采用TOPSIS法,将9大文化维度聚类为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两大类,并计算出中国各省份的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指数。为反映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的时变性,本文将各省份的流动人口与文化变量的交乘项作为最终的关键解释变量^①。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出口贸易的特征变量,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区生产总值(GDP),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industry*),外商直接投资额(*fdi*)等经济因素变量;到最近港口的地理距离(*dist*),是否中西部省份(*mid_west*),是否沿海省份(*sea_pro*)等地理区位因素变量;单位面积公路里程(*ah_road*),单位面积铁路里程(*ar_road*),单位面积内河航运里程(*as_road*)等交通通勤变量。其中,各省份的出口贸易额、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额、单位面积公路里程、单位面积铁路里程以及单位面积内河航运里程等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研究年限内的《统计年鉴》。省会城市到最近大港口的地理距离通过Google Earth查找各省会城市到香港和上海这两大港口中最近的直线距离。考虑到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海运将商品出口至国外,而一些地区因到大港口的距离非常远而选择通过陆路口岸进行出口(如新疆)。因此,出口贸易发展与到大港口的距离可能呈现“U”型曲线关系,对此本文同时引入省

^①本文的流动人口用各省份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来衡量。

会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及其平方项来反映这种非线性关系。是否中西部省份、是否沿海省份两个虚拟变量，判断的依据由该省份所属的地理区位决定。为消除变量之间波动较大对计量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各省份的GDP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不变价格处理，并对不变价格处理后的GDP、出口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到大港口的地理距离等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4. 中介变量

根据前文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本文的中介变量包括地方信任 (*trust*)、市场化程度 (*market*) 以及企业家精神 (*Entre*) 3个变量。其中，地方信任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中居民调查提供的社会信任数据。在CGSS调查问卷中涉及社会信任的问题如下：“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个体都是可以信任的？”本文对“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5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5。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采用王小鲁等 (2018)^[35] 测算的2003—2017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进行替代。企业家精神变量则借鉴林建浩和赵子乐 (2017) 的研究，用人均企业数量来衡量，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1报告了基于模型(1)式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 (Pooled_OLS) 和固定效应模型 (FE) 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第(1)-(2)列只考虑了地方文化、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以及交通通勤5个解释变量，结果显示以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为表征的地方文化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地促进效应，反映了文化创新性有利于进取和创新思维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地方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以及经济产业发展，并进而促进地方出口贸易的发展；而文化包容性则提高了地区内外开放程度，有利于资源、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对出口贸易具有强大的拉动效应。第(3)、(4)列在第(1)和(2)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到大港口的最短地理距离及其平方项，估计结果显示，在加入地理距离变量后，文化变量的回归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新加入的到大港口的最短地理距离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距离大港口越远越不利于开展出口贸易。而到大港口最短地理距离的平方项的标准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反映了出口贸易与到大港口距离呈现出明显的“U”型非线性关系。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产业结构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但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有明显下降，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系数则有小幅度的提高，说明到大港口的距离“传导”了一部分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强化了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在第(3)和(4)列的基础上，本文将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同时放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的回归系数虽然有小幅度的下降，但仍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原来

相比没有改变,系数的大小也变化不大。

另外,从表1第(6)列的估计结果来看。与第(5)列相比,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的回归系数大小均显著提高,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继续保持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到大港口的最近地理距离及其平方项的系数与混合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相比无显著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基于第(3) — (6)列的回归结果进行简单计算,可知到大港口的最近地理距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大概在1500—1600公里处出现拐点。

表1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变量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i>Pooled_OLS</i>	<i>Pooled_OLS</i>	<i>Pooled_OLS</i>	<i>Pooled_OLS</i>	<i>Pooled_OLS</i>	<i>FE</i>
<i>fp_ccul</i>	1.426 ** (0.633)		1.122 ** (0.498)		1.156 ** (0.506)	3.136 * (1.676)
<i>fp_tcul</i>		7.832 *** (0.721)		4.742 *** (0.708)	4.757 *** (0.707)	6.425 ** (2.909)
<i>lnGDP</i>	0.693 *** (0.052)	0.816 *** (0.041)	0.612 *** (0.045)	0.738 *** (0.035)	0.759 *** (0.042)	0.636 *** (0.102)
<i>lnfdi</i>	0.352 *** (0.033)	0.285 *** (0.031)	0.362 *** (0.027)	0.294 *** (0.027)	0.265 *** (0.027)	0.163 *** (0.024)
<i>industry</i>	4.795 *** (0.432)	4.230 *** (0.369)	5.243 *** (0.467)	4.540 *** (0.401)	4.695 *** (0.456)	0.392 (0.584)
<i>ah_road</i>	0.560 *** (0.106)	0.387 *** (0.101)	0.275 *** (0.104)	0.142 (0.105)	0.165 (0.104)	0.584 *** (0.075)
<i>ar_road</i>	0.150 (0.101)	0.002 (0.095)	0.271 *** (0.096)	0.144 (0.091)	0.155 (0.095)	0.155 ** (0.070)
<i>as_road</i>	0.163 (0.112)	0.053 (0.102)	0.015 (0.083)	0.056 (0.080)	0.060 (0.079)	0.258 *** (0.082)
<i>dist</i>			-0.002 *** (0.000)	-0.002 *** (0.000)	-0.002 *** (0.000)	-0.002 *** (0.000)
<i>dist</i> ²			0.000 *** (0.000)	0.000 *** (0.000)	0.000 *** (0.000)	0.000 *** (0.000)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947 ** (0.425)	-2.371 *** (0.398)	0.735 * (0.408)	-0.016 (0.372)	-0.150 (0.418)	3.493 *** (1.115)
R ²	0.8984	0.9106	0.9274	0.9316	0.9317	0.9324
样本量	618	618	618	618	618	618

注: *、**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 控制省份异质性的检验

考虑到地方(省份)异质性仍然可能会对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对其予以控制很可能导致遗漏变量问题的产生并影响到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文进一步引入中西部省份、沿海省份2个虚拟变量,考察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否稳健。表2汇报了基于混合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第(1) — (2)列分别引入中西部省份、沿海省份2个虚拟变量,发现,第(1)列中文化创新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文化包容性的回归系数同样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第(2)列中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的回归系

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1)列中中西部省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1.000，第(2)列中的沿海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为0.904，反映了地理区位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呈现出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逐渐增强的趋势。在第(3)、(4)列将省份异质性虚拟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并分别采用混合OLS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从系数大小来看，文化创新性每增加1个百分点，其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将增加1.3-2.7个百分点；文化包容性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对出口贸易带来1.2-1.4个百分点的拉动作用。从控制变量来看，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产业结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且影响系数的大小与基准回归相比变化不大。到最大港口的距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仍然呈“U”型非线性关系，但拐点出现的区间范围有所扩大，大概在1300-1600公里处。此外，2个新引入的虚拟变量，即是否为中西部省份和是否为沿海省份的回归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且东部省份的出口贸易系数显著高于中西部省份，沿海省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省份，反映了东、中、西部出口贸易发展不均衡的事实，这与地方文化特质有极大的关系，也验证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即东、中、西部出口贸易发展失衡可能是受到地方文化的影响。

表2 控制省份异质性后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解释变量	ln Export			
	(1) <i>Pooled_OLS</i>	(2) <i>Pooled_OLS</i>	(3) <i>Pooled_OLS</i>	(4) <i>FE</i>
<i>fp_ccul</i>	1.429*** (0.494)	1.073** (0.485)	1.283*** (0.491)	2.724*** (1.032)
<i>fp_tcul</i>	0.058 (0.721)	2.270*** (0.620)	1.434** (0.725)	1.243* (0.704)
<i>mid_west</i>	-1.000*** (0.066)		-0.306*** (0.108)	-0.324*** (0.116)
<i>Sea_province</i>		0.904*** (0.049)	0.685*** (0.078)	0.759*** (0.2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9524	0.9557	0.9562	0.9321
N	618	618	618	618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时变性检验

为考察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是否具有动态影响，本部分以每5年为一个时间节点的处理方法进行截面OLS估计。之所以采用每隔5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是因为考虑到经济周期、财政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短期因素可能会对检验结果产生干扰从而无法真实反映出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作用，而若相隔的时间跨度过大又无法较好的反映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动态性与渐变性。

从表3呈现的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的时变性来看，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1994—1995年文化创新性对出

口贸易的影响为负，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负向影响系数逐渐减弱，且在2000年对出口贸易的正向效应开始显现，并在此后不断增强。文化包容性在2010年的回归系数虽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已由1995年的负向系数转为正向影响，并在2010—2017年间对出口贸易的正向效应不断增强。由此说明了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渐进性、长期性和动态性特征。另外，到大港口距离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拐点不断向内陆地区延伸，由1994—1995年的1300—1400公里处延伸至2005—2017年的1500—1600公里处，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得益于中西部地区内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由大规模人口流动触发的东中西部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形成的知识外溢；另一方面得益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形成的通勤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时空距离的压缩进一步降低了贸易的交易成本。

表3 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时变性

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 Export$						
	1994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7
fp_ccul	-2.129 (1.633)	-1.211 (1.079)	1.942 (1.477)	5.473** (2.581)	7.235* (3.848)	6.872** (3.336)	6.866** (3.467)
fp_tcul	-0.841 (0.632)	-0.283 (0.201)	-0.150 (0.112)	-0.136 (0.096)	3.129 (2.011)	4.167* (2.216)	4.155** (2.06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ist$	-0.001 (0.000)	-0.001* (0.000)	-0.002*** (0.001)	-0.002***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dist^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09 (1.207)	1.459 (1.445)	3.535* (1.840)	-1.873 (1.855)	-1.923 (2.722)	3.002 (2.804)	1.106 (4.408)
R^2	0.7229	0.7111	0.6840	0.7374	0.7173	0.7201	0.7346
样本量	31	31	31	31	31	31	31

注：本表所采用的回归方法为截面 OLS 估计，*、**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表中的控制变量包括 $\ln GDP$ 、 $\ln fdi$ 、 $industry$ 、 ah_road 、 ar_road 、 as_road 。

(四)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虽然表明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但事实上地方文化与出口贸易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因为地方文化不仅可以影响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地方文化，比如由出口贸易所带来的文化舶来品有可能对本地文化造成冲击，进而对当地文化形成渐变性的改变，使得本地文化不再是稳态固定的。

为缓解这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李光勤等(2017)的研究，采用加权地形作为地方文化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考察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加权地形(dx)作为地方文化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其一，地方文化的形成与地形地貌密切相关。对于地方文化而言，山川的天然阻隔使得地方文化较少受到外界的冲击，使得文化能够保持稳定，并具有很强的地方根植性和黏性。其二，地形地貌作为一个严格的外生变量，

会对地方文化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但却很难在交通便利程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对地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李光勤等，2017）。因此，地形变量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工具变量选择。本文的地形数据来自封志明等（2007）^[36]的测算。考虑到并非所有地形对地方文化的形成均表现出显著的阻隔作用，对此，本文根据地形阻碍移民通行的难易程度对地形数据做进一步识别并加权处理，即地形区有山脉海拔超过500米且坡度大于30度的，在原数据的基础上给定0.5的权重。

从表4汇报的估计结果来看，工具变量的可识别检验（LM检验）显示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用于弱IV检验的G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约

表4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IV-2SLS估计）

变量	IV: <i>dx</i>			
	(1) <i>fp_ccult</i> 第一阶段	(2) <i>ln Export</i> 第二阶段	(3) <i>fp_tcul</i> 第一阶段	(4) <i>lnExport</i> 第二阶段
<i>dx</i>	-0.006*** (0.001)		-0.003*** (0.000)	
<i>fp_ccul</i>		2.091*** (0.437)		
<i>fp_tcul</i>				3.068** (1.45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0449	0.3411	0.0542	0.1248
LM 检验	47.584***		48.037***	
Gragg-Donald Wald F	33.90		36.46	
Sargan	0.866		0.675	
Durbin-Wu-Hausman	6.348***		7.462***	
N	696	696	696	696
变量	IV: <i>Lang</i>			
	(5) <i>fp_ccul</i> 第一阶段	(6) <i>ln Export</i> 第二阶段	(7) <i>fp_tcul</i> 第一阶段	(8) <i>lnExport</i> 第二阶段
<i>Lang</i>	0.002*** (0.001)		0.211** (0.103)	
<i>fp_ccul</i>		1.688* (0.906)		
<i>fp_tcul</i>				3.212** (1.5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2145	0.4813	0.2207	0.5246
LM 检验	38.241***		28.962***	
Gragg-Donald Wald F	27.83		34.07	
Sargan	0.733		0.824	
Durbin-Wu-Hausman	4.607***		5.392***	
N	684	684	684	684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为16),说明不存在弱IV问题。Sargan检验结果也拒绝了过度识别约束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条件。另外,Durbin-Wu-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选择加权地形作为工具变量是合理的。从第(1)、(3)列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来看,加权地形变量与地方文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地形确实会对地方文化格局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地形越封闭的地区,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往往越差。第(2)、(4)列的第二阶段回归中,在引入前文所有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与基准回归的系数值较为相近,反映了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进一步,本文使用各省份的方言区变迁作为工具变量再次进行验证。选取方言区变迁作为地方文化IV的主要原因为:第一,方言区变迁与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方言区变迁较大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好的文化创新性和包容性(朱建颂,2008)^[37]。第二,本文使用的方言调查数据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完成的,相对于本研究年限内的出口贸易具有较强的外生性(高翔和龙小宁,2016)。此外,方言区的分布与变迁主要受战争、移民、地理、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与当代出口贸易不存在必然的相关关系。本文借鉴徐现祥等(2015)^[38]的研究,以含有人口权重的各省份的次方言的使用变化来测度方言区的变迁,数据来源于徐现祥等(2015)的研究。具体测算公式为:

$$Lang = 1 - \sum_{j=1}^N S_{ji}^2 \quad (4)$$

式中, $Lang$ 为次方言区变迁度, S_{ji} 表示在省份*i*使用方言*j*的人口比重, N 为次方言的数量。表4第(5)、(7)列关于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检验表明,方言区变迁这一工具变量既不存在不可识别和过度识别问题,也不存在弱IV问题。说明以方言区变迁作为地方文化的工具变量是可行的。第(5)和(7)列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也显示方言区变迁与地方文化变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方言区变迁越大的地区,地方的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越强。第(6)和(8)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无论是文化创新性还是文化包容性的回归系数符号,基本上与原基准回归一致。因此,表4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再次表明了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推动效应。

四、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传导渠道

在检验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影响及其异质性和时变性的基础上,本部分根据前文提出的影响机制假设,从“信任渠道”“市场化渠道”以及“企业家精神渠道”三个方面探讨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传导机制。从表1可知,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满足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因此本部分直接进行中介效应的公式(2)和公式(3)的检验。

(一) 信任渠道

表5汇报了地方文化是否会通过信任的传导进而影响出口贸易的估计结果。由

第(1)列至第(4)列的回归结果看。系数 δ_1 和 γ_2 均显著为正。在进一步的 Bootstrap 检验中,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说明地方文化在影响出口贸易中存在以信任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其中,在文化创新性组别,文化创新性对出口贸易的直接效应为 1.117,通过信任对出口贸易发挥的中介效应为 0.098,仅占总效应的 9.66%;在文化包容性组别,文化包容性对出口贸易的直接效应为 5.337,而通过信任对出口贸易发挥的中介效应仅为 0.130,占总效应的 2.49%。由此说明地方文化虽然能通过提升信任水平进而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但这一中介效应极为有限,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直接效应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表 5 地方信任在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	<i>trust</i> (1)	<i>ln Export</i> (2)	<i>trust</i> (3)	<i>ln Export</i> (4)
<i>fp_ccul</i>	0.499*** (0.102)	1.117** (0.446)		
<i>fp_tcul</i>			0.540*** (0.192)	5.337*** (0.661)
<i>trust</i>		0.197*** (0.073)		0.240** (0.1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 ²	0.4107	0.9199	0.4043	0.9236
N	719	719	719	719
中介效应值	0.098		0.130	
中介效应占比	9.66%		2.49%	
Bootstrap 检验置信区间	[0.0750, 0.0794]		[0.0253, 0.0511]	

注: *、**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 市场化渠道

为识别和探究地方文化在影响出口贸易中是否存在市场传导效应, 本文在中介效应模型中引入市场化水平这一变量。由表 6 第(1)至(4)列的回归结果看, δ_1 系数和 γ_2 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且 Bootstrap 检验显示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说明存在以市场化水平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该结果表明, 文化创新性和包容性均对地方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并进一步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其中, 文化创新性每提高一个单位, 通过市场化的中介效应可带动出口贸易增加 2.020 个单位, 而文化包容性通过提升市场化水平发挥的中介效应为 2.915。另外, 文化创新性通过市场化发挥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79.67%, 说明在文化创新性推动出口贸易的机制中, 以中介效应为主。而文化包容性虽然在促进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中以直接效应为主, 但中介效应也占总效应的 39.57%, 反映了市场化是文化包容性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中介渠道。这一结论验证了前文的研究假设 H2b。

表6 市场化在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	<i>market</i> (1)	<i>ln Export</i> (2)	<i>market</i> (3)	<i>ln Export</i> (4)
<i>fp_ccul</i>	7.578*** (0.949)	0.516*** (0.134)		
<i>fp_tcul</i>			13.166*** (1.556)	4.453*** (1.034)
<i>market</i>		0.267*** (0.032)		0.221*** (0.000)
原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 ²	0.7884	0.9200	0.7922	0.9238
N	419	419	419	419
中介效应值	2.020		2.915	
中介效应占比	79.67%		39.57%	
Bootstrap 检验置信区间	[1.3766, 2.7382]		[1.9241, 4.0482]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企业家精神渠道

为检验地方文化在影响出口贸易中是否存在企业家精神渠道这一作用机制，本文引入企业家精神作为中介变量。从表7第(1)–(4)列的回归结果看，模型的 δ_1 系数和 γ_2 系数均显著为正，且Bootstrap检验显示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表明地方文化在影响出口贸易的过程中除存在直接效应外，还存在明显的以企业家精神为渠道的中介效应。其中，在直接效应上，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分别直接带动出口贸易增长0.712个和4.253个百分点。在中介效应上，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通过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分别使出口贸易增长0.295个和1.621个百分点。另外，在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组别，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9.28%和27.60%，说明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虽以直接效应为主，但企业家精神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也极为重要。这一结论也验证了前文的假设H2c。

表7 企业家精神在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	<i>Entre</i> (1)	<i>ln Export</i> (2)	<i>Entre</i> (3)	<i>ln Export</i> (4)
<i>fp_ccul</i>	2.035** (1.025)	0.712*** (0.264)		
<i>fp_tcul</i>			14.234*** (1.726)	4.253*** (0.856)
<i>Entre</i>		0.145*** (0.019)		0.114*** (0.020)
原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 ²	0.6597	0.9248	0.6957	0.9277
N	628	628	628	628
中介效应值	0.295		1.621	
中介效应占比	29.28%		27.60%	
Bootstrap 检验置信区间	[0.0868, 0.5227]		[1.1329, 2.2402]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1994—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货物出口贸易和地方文化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探讨以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为表征的地方文化对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文化创新性和文化包容性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分别推动出口规模提高1.16个和4.76个百分点;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效应,在东部比中西部省份平均高出0.324个百分点,沿海省份比其他地区省份平均高出0.759个百分点;时变性检验中还发现,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渐进性、长期性和动态性特征,且正向促进效应随着时间的推进呈波动上升趋势。②采用加权地形和方言区变迁作为地方文化的工具变量对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纠正,发现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正向影响依然稳健。③地方文化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存在三条明显的机制路径,即信任渠道、市场化渠道以及企业家精神渠道,其中信任的中介效应较弱,而市场化和企业家精神则在地方文化影响出口贸易中发挥重要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有如下政策启示:一是推进地方文化品质构建和优秀文化跨区域溢出。如通过学校教育重塑地方创新性和包容性的文化价值观,通过推动区域文化交流促进知识跨区域溢出等。二是加大文化开放力度,创建包容性文化环境。通过促进跨文化沟通和交流消除区域间的文化壁垒,进而推进区域间贸易的发展。三是发扬优秀文化理念,将“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和注重信义的商业理念融入到贸易新规则和秩序的制定及国际经济合作中以实现共赢。四是注重地方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为区域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提供持续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 [1] 李光勤,曹建华,邵帅.语言多样性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地区差异[J].世界经济,2017,40(3):144-168.
- [2] 高超,黄玖立,李坤望.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J].管理世界,2019,35(2):43-57.
- [3] 赵子乐,林建浩.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9,54(2):68-83.
- [4] 赵向阳,李海,孙川.中国区域文化地图:“大一统”抑或“多元化”?[J].管理世界,2015(2):101-119+187-188.
- [5] 才伟国,刘继楠.文化:经济增长的源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5):201-212.
- [6] COMBES P P, LAFOURCADE M, MAYER T. The Trade-creating Effects of Busi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Evidence from Fra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66(1): 1-29.
- [7] 罗能生,洪联英.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冲突的贸易效应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10):18-23.
- [8] HERGUEUX J. How does Religion Bias the Al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128(4): 53-76.
- [9] GINSBURGH V, MELITZ J, TOUBAL 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rad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25(2): 320-361.
- [10] ALESINA A, FERRARA E L. Who Trusts Other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1, 85(2):

- 207-234.
- [11] DEARDORFF A V. Lo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Cos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J]. Working Papers, 2004, 10 (1): 9-35.
- [12] EICHENGREEN B, IRWIN D A. The Role of History Bilateral Trade Flow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13] TUBADJI A, NIJKAMP P. Cultural Impact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of a PLS-PM Model to Greece [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5, 54 (3): 687-720.
- [14] SPOLAORE E, WACZIARG R. The Diffusion of Developmen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 (2): 469-529.
- [15] 白玲, 吕东峰. 国际贸易中的文化互补理论 [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6): 48-51.
- [16] 田晖, 蒋辰春. 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基于31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数据的引力模型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 (3): 45-52.
- [17] RAUCH J E, TRINDADE V. Neckties in the Tropics: A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2010, 42 (3): 809 - 843.
- [18] ZAK P J, KNACK S. Trust and Growth [J]. Economic Journal, 2010, 111 (470): 295-321.
- [19] LEE C W. Does Religion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More than Trade in Goods?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13, 20 (10): 998-1002.
- [20] GUIS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2009, 124 (3): 1095-1131.
- [21] 李红等. 国际文化合作的经济分析——以中国—东盟区域为例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22] 谢孟军. 文化“走出去”的投资效应研究: 全球1326所孔子学院的数据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 (1): 39-49.
- [23] 苏剑, 葛加国.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双边贸易的语言效应: 抑制还是促进 [J]. 学术月刊, 2018, 50 (9): 74-80+55.
- [24] 赵永亮. 移民网络与贸易创造效应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 (5): 57-64+86+88-89.
- [25] 韦永贵, 李红. 信仰的力量: 东道国宗教信仰会影响中国OFDI吗? [J]. 南方经济, 2019 (2): 108-128.
- [26] GREIF A.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 (5): 912-950.
- [27] 曹春方, 夏常源, 钱先航. 地区间信任与集团异地发展——基于企业边界理论的实证检验 [J]. 管理世界, 2019, 35 (1): 179-191.
- [28] 丁从明, 吉振霖, 雷雨, 梁甄桥. 方言多样性与市场一体化: 基于城市圈的视角 [J]. 经济研究, 2018, 53 (11): 148-164.
- [29] 高翔, 龙小宁. 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会影响区域经济吗? [J]. 经济学 (季刊), 2016, 15 (2): 647-674.
- [30] 陈宪, 韩太祥. 文化要素与经济增长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 (9): 12-18.
- [31] 林建浩, 赵子乐. 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 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 [J]. 经济研究, 2017, 52 (9): 182-197.
- [32] TINBERGEN J.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M].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
- [33] POYHONEN P A. A Tentative Model or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63, 90 (1): 93-100.
- [34]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J]. 心理学报, 2004 (5): 614-620.

- [35] 王小鲁, 樊纲, 胡李鹏.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36] 封志明, 唐焰, 杨艳昭, 张丹. 中国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 [J]. 地理学报, 2007 (10): 1073-1082.
- [37] 朱建颂. 方言与文化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38] 徐现祥, 刘毓芸, 肖泽凯. 方言与经济增长 [J]. 经济学报, 2015, 2 (2): 1-32.

(责任编辑 于友伟)

The Endogenous Culture Momentum of China's Export Trade: Power from Local Culture

LI Hong WEI Yonggui

Abstract: The article examined the mechanisms of endogenous local culture momentum on China's export trade based on the data of GLOBE and relevant cultural values. The study finds that local cultur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ness, has obvious promotion effect on export trade. This impac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l, long-term and dynamic, and shows a dynamic upward trend over time. Further, the coefficient of cultural effect on export trade in eastern and coastal provinc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regions. Finally, the impact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ness on export trade is conducted through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local trust, market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local trust is weak, while market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lay a strong intermediary effect in the influence of local culture on export trade. This research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endogenous cultural momentum.

Keywords: Export Trade; Cultural Innovation; Cultural Inclusiveness; Endogenous Momentum